



| 光明社科文库 |

1898-1908翻译文学之 “变相”研究

张 静◎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光明社科文库 |

1898-1908翻译文学之 “变相”研究

张 静◎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98 - 1908 翻译文学之“变相”研究 / 张静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194 - 4881 - 3

I. ①1…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翻译—文学史研究

—中国—1898 - 1908 IV. ①I046②I20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2553 号

1898 - 1908 翻译文学之“变相”研究

1898 - 1908 FANYI WENXUE ZHI “BIANXIANG” YANJIU

著 者: 张 静

责任编辑: 宋 悦

责任校对: 赵鸣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电 话: 63131930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songyue@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7019571

开 本: 170mm × 240mm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4 - 4881 - 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张 静

1990—1994年，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外语部，
学士；

1998—2001年，山西大学外语学院，硕士；

2007—2011年，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1994年6月至今，太原学院外语部，副教授。

参与多项省级“十一五”“十二五”教研课题；
在《外国语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等多家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前言

本书选取晚清时期特点最为突出、案例最为丰富的时段对 1898—1908 年间翻译文学实践中的变化痕迹进行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的经纬交织中，研究作为一个动态整体的晚清翻译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晚清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转型和现代风格形成中的建构和解构作用。同时以此时段翻译实践为例对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以及后殖民理论在晚清翻译实践研究中出现的误用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回溯晚清翻译实践的变化轨迹。晚清翻译实践活动的衍变递进所得出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变化轨迹仅仅是文学翻译现象的表层解说。通过对晚清时局的变化和文学翻译的相应表现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此时段文学翻译和晚清的政治姻缘由紧变松，社会姻缘由松变紧的变化趋势。中国民众在这种变化中首次获得了现代的知识教化，而文学翻译则有力地介入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转型。

第二章，回溯晚清译者心态的变化轨迹。此时期译者动机的差异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为什么译”、“译什么”以及“为谁译”。如果我们将此时的译者动机进行考察，会发现译者的翻译动机体现在不同资本的追求活动中。也就是说，译本所能体现的其实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方面的追求。而译者在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的制约下，对国别、作家、文本、历史阶段等的选择也必然带有倾向性。

第三章，回溯晚清翻译文学读者的变化轨迹。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是小说阅读发生的基础，它从经济条件和阅读能力两方面保证了小说普及的可能性。而晚清域外文学的读者构成是由十九世纪末的士大夫阶层拓展至二十世纪初的新兴知识分子阶层，最后又加入了普通底层劳动人民。同时对译者、读者和文学翻译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

第四章，回溯晚清译本中译语的变化轨迹。晚清此时的翻译作品，在语言形式上主要出现了三种不同语体的变迁：文言文、浅近文言和白话。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表面看是由“雅”趋“俗”，实际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演变过程。同时对晚清白话与“五四”白话，传教士白话与“五四”白话的同源异用现象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回溯晚清翻译文学审美体验的变化轨迹。翻译文学所激发的现代文学意识的萌生是该时期审美心理发生转变的主要诱因。时代环境的变更是该时期翻译文学促进审美心理发生转变的社会条件。而在翻译文学的阅读接受中，审美心理从传统到政治，再从政治走向多元。同时指出审美体验中的“俗化”倾向是时代和个人对国家需求和自我的需求进行心理调和的产物，是不可忽视的民众力量的体现。

第六章，以晚清文学翻译实践为例研究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对已有的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和整理，并从翻译文学的本质论论述了翻译文学为什么不具备对立性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晚清翻译实践的个案分析论证了翻译文学天生具有从跨国界、跨文化的本性，以及无法划分归属的实质。

第七章，研究后殖民理论在晚清翻译文学研究中的误用现象。从后殖民理论的适用性、晚清翻译文学的真实本质入手分析误用原因。同时从译本原语国变化说明晚清的译者有明确的翻译目的，这和弱势文化中的麻痹式文化输入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晚清的文学翻译实践也并非是“落入了狼的怀抱。”而以权利话语作为这种文学翻译现象的研究理论基础和切入点则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为什么是 1898—1908	7
理论支撑	11
概念的厘清	13
第一章 翻译实践的“变相”分析	17
第一节 在知识扩充和权力牵制中递进衍变	17
第二节 现代知识教化的获得	23
第三节 个案分析:以王韬、陈季同、林纾为例	44
第二章 译者心态的“变相”分析	49
第一节 寻求新的社会资本以启蒙教化	51
第二节 寻求新的文化资本以改国人知识结构	58
第三节 寻求新的经济资本,偏重译者个体行为	63
第四节 个案分析:以《天演论》《域外小说集》《迦因小传》为例	71
第三章 读者构成的“变相”分析	77
第一节 晚清域外文学的读者产生的原因和构成上的渐变	77

第二节 译者、读者和文学翻译间的互动关系	85
第三节 个案分析:以《国闻报》《新小说》和《月月小说》为例	94
第四章 译语的“变相分析”	100
第一节 文言:初期译者和读者共同的选择	101
第二节 白话、文言:高峰期的对立	106
第三节 同源异用	109
第四节 个案分析:以传教士、周桂笙、包天笑为例	118
第五章 审美心理的“变相”分析	125
第一节 转变的条件	125
第二节 从政治审美到诗学追求再到多元并存	130
第三节 再论晚清文学“俗化”的价值	142
第四节 在翻译文学锋芒下被忽略的“俗化”审美体验	151
第五节 以梁启超、徐念慈、包天笑为例	157
第六章 翻译文学的归属	165
第一节 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争论	166
第二节 翻译文学的非独立性和滑动形式	171
第七章 后殖民理论在晚清翻译文学研究中的误用	192
第一节 后殖民理论和它对晚清文学翻译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193
第二节 后殖民理论的误用和晚清文学翻译的真实本质	200
结 语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23

“首介之功”，因为译本的体例和语言还遗存着“长长的传统的尾巴”^①。但是，晚清的文学翻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翻译高潮，域外文学不但有历时的承前启后特点，也有共时的沟通中西的作用。翻译文学是维系中国传统文学命脉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尤其是危难时期晚清的域外文学的翻译高潮让古老的中国文学能够得到新鲜的补给并生存至今、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其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如此简单。既然对晚清文学要“还以背景，还以公道”，那么对这一时期的域外文学翻译的价值批评也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对于此时段的研究还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问题意识，但研究深度不够。郭延礼在其《中国近代翻译述略——兼论文学翻译迟到的原因》一文中认为文学翻译在晚清迟到的原因有三：1. 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2. 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自我优越感的作祟。3. 文学翻译较一般翻译为难。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即便是在当代各种翻译软件发达的今天，科技和社会学文章也未必就比文学翻译简单。因为科技用词和社会制度语汇中包含大量专业术语、特定含义和固定句式，往往简单的一句话中包含着多重意义。而在晚清，对西洋科技和民主制

① 很多学者对晚清文学翻译的诟病主要集中于：所谓的“误译、改译、删译和增译”现象过多；译著缺乏经典，译本品味不高等问题。其实，这些在翻译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结合文化语境来看，译本所呈现出的样态并非是简单的翻译水平问题，这些看似“失误”的策略有时又是译者十分必要的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同时，也许有民族自尊和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素的影响，很多学者对于晚清文学翻译的功绩有刻意回避现象。比如学者王东风在论及翻译选材时，曾引述过 Venuti 的言论：“霸权文化为这些民族国家所选择的待译文本往往是像传奇或惊险小说这样的通俗体裁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在想象的认同中引发愉悦，却不能生成由高雅审美引发的那种超然的批评。而这些译本所引入的英美价值观念则会培养出一批西化的、无视本土文化的精英读者。”并进一步论述这些人：“不经意地落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陷阱，不自觉地经历了思想‘被翻译’的过程。一大批所谓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和黑皮白心人就是被‘翻译’过去的文本。”王东风的论述是有所指的，重点强调的是那些“在后冷战时期充当帝国在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从而在异国他乡成为一群迷失家园与身份的‘少数族’”。但问题是很多论者于是乎立刻将其和晚清的文学翻译进行关联，认为此时盛行的侦探、科幻等小说对国人起到的是麻痹和娱乐作用（参见《文化霸权下的近代中国翻译》蒋天平 1，段静 2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而忽视了这类题材小说中蕴涵的科技、创新和法律意识等国人需要的东西。

度尚且十分陌生的阶段，对它们进行比较准确的翻译更加困难，所以这第三个结论实在有待商榷。

随着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和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引进，很多学者借用了这些成果对晚清的文学翻译现象进行研究。这样做无疑为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但也许是对这些理论在认识上还有局限，或这些理论本身就还存在着不足，所以经常出现解释上的力度不足。比如谢天振认为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①可以很好地解释晚清的文学翻译现象：“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但在同样的文章中他又随后进行如下论述：“清末民初的中国译者则“实际上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域外小说艺术价值的怀疑，因此，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的显然仅是边缘位置，于是译者对所译作品或是随意删改、或是‘削足适履’，把原作生硬地套入、译入语文学中的现成模式，如把西洋小说‘翻译’成中国章回体小说的模样，等等，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翻译的‘充分性’。”这种论述明显产生了让人迷惑不解的矛盾，既然翻译小说可以占到出版发表小说的五分之四，它又何至于仅仅是处于当时的“边缘”位置呢？这到底是理论运用的偏差还是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呢？还是现象本身有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呢？出现这些研究上的悖论是和理论

① “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概括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这种情况下，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Even-Zohar, 1990）

适用性的理解有关。类似的情况在后殖民理论对晚清文学翻译的研究中也常常出现，本书将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

晚清的域外文学翻译现象复杂而丰富，几乎所有有关文学翻译的种种问题和状况在晚清都可以找到例证。在很多有关文学翻译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用晚清的文学翻译现象来作为佐证。这也造成对它的研究过散、过粗，没有逻辑、缺乏系统性，忽略了对很多很有意义的问题的研究。比如樽本照雄有过一个统计：“若抽取从 1840 年到 1920 年发表的作品来看，辛亥革命以前（1840—1911），创作有 1288 种，翻译有 1016 种”，“1911 年以前创作笔翻译多 1.27 倍，翻译只占 44% 而已。……实际的情况是：‘创作多于翻译’。”樽本照雄纠正了阿英的统计错误：“从具体数字看，阿英说的‘翻译多于创作’这样情况，只出现在 1902 年到 1907 年间的 6 年。”这样的纠正实际上就引出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为什么在 1902 到 1907 年的六年间，而不是其他时间会出现翻译多于创作的现象？”“如果对这六年间原语国别进行溯源，又会有什么发现？”“在大力输入域外文化的晚清，文学创作为什么依旧可以多于文学翻译？”“翻译的双重性——对中国文学的建构和解构和译者的矛盾心理——文化输入的接受和焦虑之间会怎样相互作用？”这些问题对于晚清的文学翻译研究而言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对于晚清域外文学翻译的研究还缺乏宏观和微观上的结合研究。

目前，对于晚清域外文学翻译的宏观研究主要体现在翻译史方面。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有：（1）着眼于文学翻译的活动事实。这是一种历时的、线性的和材料梳理性的宏观研究。这种翻译史的编写方式以编年史为主。近十几年间，编者开始在史实梳理的基础上也关注了诸如译者动机、翻译类型、译论流派和承继关系等问题。比较有影响的几部翻译史的编者均对此类问题进行过相关论述。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注重的是：“以文学翻译活动的事实为基础，以脉络为主，阐明翻译文学的发展历史和规律，并力图对翻译文学家的翻译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翻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和它同其他形式的文学的不同点等问题进行探讨”。陈福康认为，按历史发展顺序写，“缺点是容易写得平，‘只见树木不见林’，成为关于一个个译论者的单篇评论的汇编；

优点是可以对这些重要译论者论述得较为详尽,并为研究者提供较多的资料信息。”而不拘泥于时间先后,重组资料的写法:“缺点是容易写得浮,‘只见林不见树’,在未发掘和占有详尽资料时容易‘以论带史’,……优点则是容易显出‘理论性’和‘体系性’。”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采用的也还是前一种编写方式。《20世纪中国翻译史》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部叙述我国整个20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作者方华文依旧以时间为坐标宏观阐述了20世纪中国的翻译活动,并在其中旁及产生翻译活动的环境。重要的是该书首次将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历程串联起来,对晚清的译论研究提供了脉络上的思路。(2) 着眼于文化研究的翻译活动研究。1997年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出版,自此研究开始出现了转向,从过去的单纯翻译技术层面转向了文化层面,使研究着眼点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和翻译实践上,不再仅仅是翻译文本内部的探讨或是翻译活动的技术性研究,而是将文学翻译也纳入到社会文化体系中进行研究。这不但拓宽了研究的区域和视野,也让文学翻译研究有了更多的思路。但随着社会文化眼光的介入,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又有了文化失控的表现,似乎以前所有不能解释或解释得比较勉强的现象一旦用文化来解释就全行得通。从零散个案中很容易就看出翻译和文化中存在的互动关系。但很多论者对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浅尝辄止,以个案例证指出有互动关系就将研究终止。这种一招行遍天下的做法省力、讨巧,时至今日还很盛行。而对于晚清文学翻译中真正涉及文化系统问题的研究,比如翻译活动和社会文化互动的轨迹探寻;翻译在文学转型时期对社会文化和文学内部的规范方面产生什么影响;翻译中蕴涵的观念意识从何而来;文学翻译在晚清的发展规模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则较少有人探讨。(3) 着眼于比较文学的文学翻译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一改以往的历时性研究传统,将共时性编排方式引入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当中,这样做可以避免研究中的顾此失彼。但比较研究往往需要对所比较的对象有比较详尽的资料在手。而晚清的资料多而且乱,最具有权威的资料集中于文学史和翻译史中。所以,比较研究多以译者的译介策略、主张和风格为主,对于同时期的国外类似状况的比较研究较少涉及,即便有也以和当时的日本进行比较为主。还有就是以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和近代翻译进行历史比较,这方面的成果也是反映于翻

译史中或散见于单篇论述中(数据见资料综述)。所以,在晚清文学翻译的比较研究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①(4)将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历史结合共同研究。这是香港学者王宏志提出的一种研究框架。在此之前,由于很多论者自身翻译实践不多,使翻译史的研究基本无法涉及翻译实践理论,即使是有所涉猎也是翻译理论的整理收集,所以翻译史的宏观研究缺乏的是论述的深度和理论对翻译实际的关照。虽然该研究框架仅仅是王宏志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将译者、读者、翻译语境和翻译赞助人等属于微观研究领域的因素引入了宏观研究当中。^②

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成果可谓丰富至极。尤其是对此时段的译者动机、翻译策略、读者接受和译介主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译者动机研究中除了对本国译者的翻译心态进行分析外,还对外国译者尤其是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和动机进行了分析,这是对目前研究晚清文学翻译的一个很有益的补充。翻译策略上以个案研究为主,分析重点基本集中于归化和异化、普遍性和差异性等方面,结合文化和翻译的相互制约性进行了非常有深度和有创见的探索。读者接受则是受到现代叙事理论的影响,尤其是运用姚斯的“读者反映理论”来进行晚清域外文学读者的心理分析。译介主张的研究基本上以译者的翻译见解为研究对象,或对其进行梳理总结,或结合译者的翻译实践进行分析评价。

上述研究成果无疑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对中国文学的构建而言,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独具见地的研究视角。但对于晚清文学翻译的研究而言,不仅是对晚清的文学现象进行史料补充和个案分析,更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学

① 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中专辟一章,对近代中日翻译事业从萌芽期第一过渡期和发展期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谢天振和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中,虽然没有明确单列出比较研究的章节,但在论述亚洲诸国文学的翻译时,附带对日本同时期的译介情况作出了一些横向的比较。其他史类研究中较少涉猎比较研究。另外,根据目前可以掌握的资料看,以近代文学翻译为主题进行比较研究的几乎没有,仅仅在书中以例证出现,而且同样是集中于中日比较,如:《浅析中日近代翻译小说的差异》《中日“文言一致”运动试比较》《近代中日政治小说比较》《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中日近现代文学主潮比较》《中日小说近代变革之比较》《中日近代小说形成之比较》。

② 王宏志虽然仅仅给出了构思而没有付诸于实践,但其思路中却有很多创新之处,比如在章节安排上舍弃编年史模式,以个别专题为纲领等,同时结合当代翻译理论形成研究框架。虽然仅是个构思,但比此前的翻译史的研究上有了明显的突破。

走向的历史溯源和未来追问。以中国文学中晚清的“现代性”发生为突破口，将研究前延至近代并后伸至当代；以新的眼光将宏观和微观、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研究和评价晚清域外文学的翻译，不是为了给过去做个合理的了结，更是为了回答中国文学今天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晚清域外文学翻译基本特点的同时，关照当代文学翻译中的诸多问题如：译者的翻译主体作用并进而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主体性问题；从中国文学第一次的流行研究通俗文学的本质和价值；探讨中国文学能够突破传统，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基本动力是自身文学传统的自主更新还是依附于西方文学的“借尸还魂”式的发展，或是被动的弱文化的被改造等问题，也才能在晚清域外文学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研究中分析出晚清的现代性是五四新文学的量变准备还是中国传统文学本身已经发生了质变。所以，本书以晚清的域外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但真正关照的是中国文学的现在问题。对个案的考察是为了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构建进行宏观的分析，进行宏观研究又是为了寻求个案在中国文学历史中的走向。因为本书不可能对大量的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进行穷尽分析，所以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1898—1908这一时间段内的域外文学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期望能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

为什么是 1898—1908

本书把研究的时间定于晚清 1898 年至 1908 年。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断代研究。之所以把研究的上限定于 1898 年，是因为中国的现代性“体验”^①是从这一年开始真正发生的。

① 本书没有用“现代性转型”而是用了现代性“体验”一词，因为笔者认为真正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至少要到十年以后甚至更晚才实现。此时的中国，无论是社会思想、人文心理还是文学样态，基本上还处于现代性的体验阶段，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开始。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在时间上并不一致，二者出现了十几年的时间差。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应当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对于这一点详见本书后面的论述。

从“史”的角度讲，无论是从近代文学史、近代翻译史还是近代思想史来讲，1898 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

晚清自上而下开始了政治上的维新变法，虽然振聋发聩，但也是在这一年就夭折了。政局的改变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以后的走向，社会各个方面都对此出现了反应。而文学家们对 1898 年的重视则表现在断代方面，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年视为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的转折点。陈子展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先驱，他认为应该将“近代文学的起点定于“戊戌变法运动”，因为，“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① 陈平原和陈子展的观点接近，他认为“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年说起”，是“戊戌变法把康、梁等维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了文学舞台”^②。1898 年的文学界，借助政治的外力，一改往昔传统沉闷的步履，文学观念、语言观念、文学传播方式、作家的生存状态及其创作面貌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快速。

首先，严复在这一年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展示给中国。这部既可以说是哲学、社会学专著，又可以说是文学、文化文本的巨作，让思想领先的中国知识分子找到了打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突破口。他的“信”、“达”、“雅”的主张也成为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的圭臬。在《天演论》中，严复翻译了英国诗人蒲波的节选诗《原人篇》和丹尼森的节选诗《尤利西斯》。这是我国所译的最早的、具有专业水准的汉译诗歌，从此拉开了中国译者对英语诗歌翻译的序幕。^③ 其次，林纾在本年与王昌寿声泪和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并于次年出版。这不但揭开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纪元，而且从这一年开始，翻译成就逐步开始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真实的参照并就此参与了中国文学的格局的改造。同时，《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受欢迎程度也意味着国人对外国文学由原来的自负高深和先入为主的偏见转为认真的关注，提升了西方文学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再次，1898 年底《清议报》在横滨创刊，

① 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上海: 上海中华书局, 1929: 6.

②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8—1916), 第一章, 起点中文网.

③ 贺麟. 严复的翻译. 东方杂志, 22 (21).

梁启超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这篇短短八百字的文章，却是梁氏两篇最重要、影响深远的小说理论之一（另一篇是发表在差不多两年之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中不仅倡导了政治小说的翻译，使小说的地位有了提升的可能，同时也使功利性目的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目的之一。“要翻译外国小说以作为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手段”并不是以《译印政治小说序》为始，但实际行动却由梁氏开始。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明确地写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意向。“……欧西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

封建帝制在1908年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一年的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王朝的名义统治者——光绪皇帝，驾崩于瀛台涵元殿，次日，也就是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实际统治大清王朝48年的慈禧太后，在中南海的仪銮殿离世。而这二人的相继离世，给本已风雨飘摇的封建帝国以沉重的打击，但也让各种思想的登场有了希望。更重要的是晚清文学翻译至此时已经基本完成其发生样态。也就是说，它虽不成熟，也不固定，但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所能提供的各种参照在此时已经基本成型。至于到民国初期和“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和文学翻译的走向则应该说是脱胎于此时段的各种文学现实中。

研究对象定为1898至1908这10年间的翻译文学，除了是因为此时段的中国翻译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具有极强的过渡性特征和环环相扣的推进式演变，并在这10年中都有突出表现外，还因为笔者认为如果要对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描述，必须找到可以产生足够研究空间和研究对象的研究视域。而该时段中所涉及的种种翻译文学的现象背后，有着庞大而复杂的、涉及中国文学发展走向的诸多文学因素和中国社会、文化转向等的超文学因素。这些因素和此时的翻译文学互为表里，研究时可以找到典型的对象、例证和典型的特征。同时，把清末民初复杂的中国文学现象尤其是翻译文学现象缩小到这典型的10年中进行研究，研究对象不会因其庞杂而散失目标，论述和论证不会因其

复杂而无法深入。所以本书将晚清文学翻译的研究定在这 10 年间，而不是整个晚清或清末民初，就是为了使研究既能够有一个历史维度上的跨度，有足够的研究空间、时间和信息容量，能在较为全面的概貌上进行。同时也考虑到晚清文学翻译史实量大，思想复杂，如果想要将问题研究得比较透彻、系统和深入，就不能将研究领域定得过大，这样会力不从心。而将研究缩短至这 10 年间，可以让研究的领域相对集中，论述可望更加准确合理。当然，本书所设定的、研究上的时间上限和下限也并不是绝对就控制在这 10 年间的，尤其在变化轨迹的论述时，为了将其轨迹阐述得更加清晰，往往会突破这种时间的上限和下限。

所以本书选取 1898—1908 年间晚清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就好像进行医学上的切片研究，通过这一部分尽可能全方位的研究，来投射出整个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影像来并进一步关照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种种文学翻译现象。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所设的时间上的界限只是为了能够在时间线性发展的维度上为研究提供一方便。取 10 年整段时间进行研究有取其便利的考虑，更是因为本书所要研究的文学翻译中各种变化轨迹主要是集中于这 10 年间。这是一个极具过渡性和争议性的 10 年，也是文学史上最复杂、最混乱和非常具活力的十年。10 年间中国的翻译文学从翻译重心、翻译样态到翻译目的、翻译理论等都发生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至少是体验性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 10 年，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激烈的思想论战使中国人在感受到欺辱和愤懑的同时，还能借翻译文学的外力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必要。从中既可以见证到传统文学的抗争，也可以看到近代文学的转变，更可以窥视到现代文学的萌发。变化的轨迹在此时段确实是比较集中的。本书认为晚清文学翻译中最大的特质就是变。变是历史的必然走向，但中国文学在对传统的反叛中往哪里变，变的程度如何，变的结果是什么，对这些问题只能有结果，却不能有规律和必然性。而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各种变的可能，它和“五四”至今中国文学所形成的各种格局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